

[总24辑 2010年3月出版]

王东京/主编

中国经济 观察

CHINA ECONOMIC SURVEY

透视转轨中的价格问题

企业家尤其是国企经营者如何定价
关系民生的水、电、气等如何定价
影响百姓安居的房地产如何定价

2010年宏观经济走向

宏观经济政策正常化主线/结构调整主线/后危机时代全球化主线

教育的末路与出路

教育资源既有总量投入不足又有结构的问题
教育在异化，手段与目的倒错
教育的泡沫化，通胀式地制造和滥发文凭

大国发展与民意诉求 要现代化也要“天堂”

55
0

中国图书出版社

[总**24**辑 2010年3月出版]

中国经济 **观察**
CHINA ECONOMIC SURVEY

王东京 / 主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经济观察. 总24辑/王东京主编.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0.3

ISBN 978-7-5006-9236-2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经济-中国-文集 IV. ①F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41355号

中国经济观察 总24辑

主 编 王东京

责任编辑 方小玉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 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010) 84046485

门市部电话(010) 8403965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00×1000 1/16

印 张 11.25

字 数 135千字

版 次 2010年4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0年4月河北第1次印刷

印 数 1-8000册

定 价 25.00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84047104

顾 问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 珏	江小娟	刘 伟	刘海藩
李兴山	张卓元	张尧学	宋 涛
林毅夫	顾海良	梁小民	

主 编 王东京

副主编 赵振华 (常务) 韩保江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列)

万安培	王天义	王东京	王国平
王 健	宁向东	张 军	张维迎
陈甬军	陈晓红	杨秋宝	杨瑞龙
郑介甫	柳 欣	赵振华	洪银兴
顾海兵	黄少安	梁 朋	韩保江
谢鲁江	潘云良		

学术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列)

于永臻	王君超	石 霞	田应奎
刘振英	刘艳梅	李 蕾	李继文
李省龙	李旭章	李 鹏	张玉杰
张燕喜	陈文通	陈宇学	赵锦辉
施 虹	胡希宁	徐平华	徐祥临
贾华强	曹 立	曹 新	董艳玲
鲍永升			

编辑部主任 孙小兰

主 办 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

目 录 Contents

■ 热点聚焦 Hot Issues in Focus

赵振华 003 透视转轨中的价格问题

巴曙松 015 2010年宏观经济走向

■ 探索与争鸣 Exploration and Contentión

刘春雷 031 教育的末路与出路

王佳宁 037 大国发展与民意诉求

左晓蕾 054 中国经济要更平稳更平衡增长

张建君 059 中国发展需要强大的基础设施

■ 改革与发展 Reform and Development

姜 波 069 国际话语权与国家形象

顾海兵 084 没有自主就没有一流大学

潘云良 092 换一种思路改革国企产权

党国英 105 城镇化基础上的城乡一体化

■ 财经观察 Finance Observation

高辉清 119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亟须规范

张吉光 131 城市商业银行扩张与调整

贾 康 147 实现公共投资与社会投资的互动

■ 短论 Remarks

王忠明 159 “创新”三问

乔永清 163 要现代化也要“天堂”

赵 晓 169 追求更丰盛的人生与更成熟的经济

Contents

■ Hot Issues in Focus

- 003 Zhao Zhenhua Perspective into Price Problem in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015 Ba Shusong Trends of Macro Economy in 2010

■ Exploration and Contention

- 031 Liu Chunlei Education's Impasse and its Way Out
037 Wang Jianing China's Development and Appeal of Public Opinion
054 Zuo Xiaolei China's Economy Requires a More Stable and Balanced Growth
059 Zhang Jianjun China's Development Demands Strong and Solid Infrastructure

■ Reform and Development

- 069 Jiang Bo Our Voice in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vs. Our National Image
084 Gu Haibing No Autonomy, No First-rate University
092 Pan Yunliang Another Way to the Reform of SOE Ownership
105 Dang Guoying Urban-rural Integration Based on the Urbanization

■ Finance Observation

- 119 Gao Huiqing More Regulation is Needed for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in
Local Governments
131 Zhang Jiguang Expansion and Adjustment of Urban Commercial Banks
147 Jia Kang Interaction of Public Investment and Social Investment

■ Remarks

- 159 Wang Zhongming Three Questions about Being Creative
163 Qiao Yongqing Being Modernized as well as Remaining a Paradise
169 Zhao Xiao A More Meaningful Life with a More Mature Economy

A stylized, grayscale city skyline with various building silhouettes of different heights, serving as a background for the top half of the page.

热点 聚焦

HOT ISSUES IN FOCUS

透视转轨中的价格问题

2010年宏观经济走向

透视转轨中的价格问题

赵振华

价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似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三岁小孩都知道要吃糖葫芦需要付钱而不能白拿。然而，看似简单的问题，却隐含着十分复杂的道理，学过经济学知识的人都知道，价格关系民生，价格诱导消费，价格引导资源配置方向。中国搞了三十多年的改革，绝大多数商品已经放开价格，但价格改革并没有到位，依然值得深入探讨。

一、价格改革任重道远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所有的商品严格意义上应该称之为产品，实行的是固定价格制度，其基本特点就是价格由政府制定，长期处于冻结状态，2分钱一盒火柴，3分钱一枚鸡蛋等现象延续了大约二十年。既不反映价值也不反映供求关系的价格，必然导致产品供应越来越奇缺。因为赔钱的买卖谁也不愿意干，物资奇缺，丁点儿大的事都需要开后门。老百姓买辆自行车要开后门，买台缝纫机也要开后门，甚至买斤肉呀蛋呀什么的都如此，老百姓烦透了。

要搞市场经济自然就需要放开市场，放开市场必然形成市场价格。

因此,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基本上是沿着放开价格的思路展开的,先是不重要的消费品如针头线脑、锅碗瓢盆之类进入市场自由交换、自由定价;而后重要的消费品如自行车、手表、粮食、肉类等也进入市场,由市场定价。生产资料价格如钢材、水泥等经历了80年代中期双轨制之后绝大多数最终并入了市场价格这一轨道。有了市场就有了市场价格,有了市场价格就可以刺激生产。市场活了,生产者就有了积极性。既然生产者从市场中得到了好处,谁不想多挣点钱,于是乎就拼命地组织生产,没过几年工夫,中国绝大多数商品便出现了供大于求的局面。

1978年的改革到现在也不过短短的三十一二年时间,中国已从原来的短缺经济转向了过剩经济,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造大国,全世界各个角落都能看到中国的商品。消费者也得到了好处,起码想买什么市场上就有什么,再也不需要托熟人走后门了。无怪乎有人感慨只有想不到的商品,没有买不到的商品。从商品数量来看,99%以上都实行了市场定价,自此,价格改革的任务似乎完成了,从中央到地方原来专设的物价部门大多数已经撤销或合并。在老百姓的视野中,商场和自由贸易市场都是自由定价,国家定价的影子基本消失了。80后特别是90后的年轻人大多数不知道什么叫国家定价,只知道按商场价签取货付款,或到市场中讨价还价。

然而价格改革任务真的完成了吗?答案是否定的,理由有三:一是生产要素的定价机制尚未形成,特别是企业家价格尤其是国有企业经营者价格发现机制还未形成;二是关系民生的一些重要产品的价格如水、电、气等定价机制也尚未形成;三是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涉及的土地征用和房地产拆迁价格尚未形成。上述这些生产要素或产品都不是鞋袜、玩具之类,而是重要的生产要素或消费品。要么牵一发而动全身,直接影响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要么其他条件不成熟,难以形成市场价格,对这些产品既不能一放了之,也不能一统了之。看来中国价格改革

依然没有到位,价格改革依然路漫漫。

二、国有企业经营者价格需要通过市场来发现

近年来,国有企业经营者收入引起了广泛关注,其实质是企业家价格的确定问题。有人说企业家收入高了,也有人说他们的收入低了。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有人提出,国有企业经营者应该拿公务员收入。因为他们还有行政级别,特别是在实践中,还存在今天在国家机关任司局级干部,明天到国有企业任总经理;或者今天是企业的总经理,明天到国家机关任司长或地方的市长市委书记之类的现象。但也有不合理的地方,如果企业老总拿国家机关公务员的收入,与效益不挂钩,也就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收入,而下属人员拿企业的市场收入,即与企业经济效益挂钩,必然会出现企业老总收入不如下属分公司或子公司经理收入多的现象,也就是“总公司老总坐奥拓,分公司经理坐奥迪”,这势必导致大量的总公司老总寻租行为的产生。如果下属人员也相应地拿行政人员的工资,就会导致上下均无积极性,成为用计划经济办企业了。显然这条路是走不通的。有些地方为了限制初次分配中收入差距过大的现象,特别是解决有的企业或行业职工收入不增长但老总收入过快增长的现象,在实践中提出了国有企业老总的收入要与职工收入挂钩,职工收入增长老总收入才能增长,职工收入不增长老总收入也不能增长。这种办法有一定道理,但也存在问题,因为劳动力收入是通过劳动力市场来形成的,当然通过一定的行政干预或工会组织的干预,劳动力的收入会高于市场供求均衡状态下的收入。而企业家显然不是普通劳动力,不能用普通劳动力市场的价格来影响企业家价格。就像不能根据萝卜的价格来决定香蕉的价格或者用沙子的价格决定黄金的价格一样,萝卜价格不涨香蕉价格也不能涨,沙子价格不提高黄金价格也不能提高,这显然是无道理的。有的地方则根据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比例确定

老总收入,这种办法有一定道理,但也存在缺陷。比如,国有资产要受价格变动的影响,如近几年房地产价格猛涨,即使企业经营亏损了,但由于拥有的房地产价格上涨,也会导致国有企业资产大幅度上涨,国企老总收入按比例增加显然没有道理。况且,作为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其目的更多的是获得利润,如果仅仅与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相联系,显然有缺陷。国务院国资委出台的办法则是通过一系列参数将国有企业经营者收入控制在本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12倍。这一办法有其合理的地方,但这些参数如何确定,为什么是这样的比例而不是那样的比例等等,最终的结果为什么是12倍,而不是11倍或13倍等,都容易引起质疑。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方法或思路都反映了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如何解决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收入问题,应该说有一定道理,但不是根本出路。

国有企业经营者收入究竟如何确定,核心的问题是要形成企业家价格的市场发现机制。笔者曾经在《中国经济问题》发表了《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收入该如何确定》的论文,在这里再略作引用,以进一步探讨该问题。2005年,笔者有幸到艾克森—美孚石油公司访问,公司总经理年薪达到3600多万美元,我问公司相关人员,如何看待老总的年薪,是否太高了?他们摇摇头,说应该拿,如果没有这么多的年薪,老总就会被别人聘请。我由此联想到,艾克森—美孚老总3600多万美元的年薪也没有人说高了,为什么到了国内,国企老总就那么十几万、几十万元的收入便有人天天嚷嚷收入高了呢?另外一件事就是我分别在国有企业老总培训班和党政干部培训班就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收入问题做了一个调查,结果大相径庭。国有企业的老总几乎一致认为,收入太低了。他们说,国外同样规模的企业,其经营者收入都达到数百上千万美元,国内只有区区十几万元大不了几十万元人民币,简直是天壤之别。而党政干部几乎一致认为,国有企业老总的收入太高了,他们说,今天你在国家

机关是司局长，一年的收入也就是几万元，明天摇身一变成为国企老总，一年的收入就达几十万元，凭什么拿那么多？特别是有些国有垄断企业，可以说让谁干都一样，都会产生业绩，如果经营者收入同资产收益或利润等指标挂钩显然也不合理。同样的收入，在不同的人看来，效果是不一样的，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冥思苦想之后，我发现问题出现在了经营者的选择机制上。之所以国外老总的收入那么高还能够被接受或认同，归根结底，他们的老总是由董事会通过市场办法选择的，他们的收入是由市场决定的；而我们国有企业的老总是通过政府任命的，其收入多少缺乏一个公认的依据，必然产生老总说少，其他人说多的现象。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出现了一大批私营企业家，也没有哪个人对他们的合法收入说三道四，因为他们的收入是由市场决定的。

要解决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收入，其基本前提是国有企业经营者的选择机制，要变政府任命为市场选择，这一问题解决了，其收入问题自然而然就解决了。因此，解决企业家收入问题，关键是形成企业家市场，有了企业家市场就能够形成企业家价格，市场价格无论是高还是低，都是合理的。搞市场经济，就得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凡是能够由市场决定的问题，政府就要少干预、不干预。政府干预越多，市场机制就越有可能被扭曲。由市场来选择国有企业经营者，会不会与党管干部的原则相矛盾呢？答案是否定的，党组织在经营者的选择中拥有否决权，即对通过市场选择的多个被选的经营者的考察，把认为不符合党的要求的投否决票即可，或认为最符合要求的投肯定票即可。况且，通过市场选择的经营者会更努力地实现董事会的目标，企业规模越大，效益越好，经营者的社会地位会越高，其市场价格与预期收入也会越高；否则，企业效益越不好，他们的市场价格就越低，预期收入也越低，甚至会有不良经营记录而无人聘请。通过市场选择经营者，也可以避免一些无经营才能的经营者异地做官或通过行政手段到其他企业继续当老总的不合

理、不正常现象。

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竞争性国有企业的经营者比较好办。你经营得好坏,在一定时期内就能表现出来,同样的产品,别的企业都赚钱,你经营的企业亏损,表明你经营得不好,企业家的声誉就会受到影响,价格就会降低,收入随之降低,反之也一样。难就难在垄断性国有企业经营者的价格如何确定?笔者认为,问题的关键是不能把因垄断带来的收益归企业家所有,而是应通过垄断税的方式收归国库,剩余收益可以按照企业家市场定价来执行。

三、构建阶梯水价新机制

2009年不少地方对居民用水价格进行了调整,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和强烈反响。应该说选择的时机是对的,因为,当年我国物价负增长,提高水价不会助推通货膨胀,问题在于不少地方只是提高用水价格,没有形成合理的价格确定机制。

就价格听证来说,制度本身还存在不少缺陷。以前涉及国计民生的产品调价,如居民用水价格都是政府直接定价,居民没有参与权,为了更多地反映民意,前几年就开始实施调价之前的听证制度。固然,有听证制度比没有听证制度要好,这是一个进步。但听证中也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引起了社会的质疑,如参加人员的收入高低、素质高低、人数多少等。从人员素质来看,从全社会随意抽取也就是以抓阄的方式产生听证者难免有文化教育素质不高者,他自己都搞不清楚水价意味着什么,怎么能提出合理化建议呢?从收入来看,我国地区之间和地区内部的收入差距都是比较的,自然有高收入者、中等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不同的收入群体对同一水价就会有不同的反应,水价的提高对不同收入的家庭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如果参加听证的大多数是高收入者,那么提高水价对其生活没有什么影响,自然就赞同;如果大多数是低收入者,反

对声音就会大一点。从选择人数来看,一个地方居民用水价格小到一个县城,大到一个直辖市,几十万乃至上千万人口,只选择那么十几个,大不了几十个人,是不能反映民意的。因此,听证制度存在着残缺,需要从制度上加以弥合。我认为,与其让随意抽取的几十人来听证,不如让人大代表来论证和辩论。原因是水价调整直接涉及企业的利润、居民生活和资源节约等,水价调整不是政府尤其不是物价一个部门的事,也不能由政府直接决定:想什么时候调就什么时候调,想调多高就调多高,而需要人大代表讨论决定。因为人大代表是老百姓选出来的,具有代表老百姓利益的合法基础。调还是不调不是政府说了算,而是代表老百姓的人大代表说了算。从结果来看,不少地方听证会完全变成了走过场,其实他们的调价方案早就作好了,听证与不听证都一样,只不过是表面上执行制度罢了,结果都是涨价。当然,目前水价较低,适当提价是必然的,但调价绝不意味着普遍涨价,听证也绝不意味着就是为涨价论证。

问题的关键是要改革水价形成机制,而不是单一的提价。水价的调整要反映其成本,老百姓的承受能力以及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从目前来看,更多地方水价的调整,变成了水价的普遍上涨,而没有形成合理的机制,在不少地方引起了老百姓的反对。因为水是老百姓的日常必需品,人可以一天不吃饭,但不可以一天不喝水。合理的水价应该是阶梯水价,也就是用水量越大,水价越高。既保证老百姓的正常需求,也可以节约资源。对于正常需求范围内的水量,可以实行低价甚至免费使用。假如一个三口之家,每个月10吨水(仅仅是举例说明)就可以满足基本需求,那么10吨以内完全可以实行低价格,超过10吨之后,表明存在浪费,就大幅度地提高价格。第11吨水可以每吨10元,第12吨水可以每吨20元,第13吨水可以每吨50元,第14吨水可以每吨100元,以此类推。这样一来大多数老百姓没有因为水价调整而多支付水费,少数

用水量大的家庭一定是高收入家庭,多支出水费也不会在乎。对于水处理企业来讲,水费收入一定提高了,因为总是会有用水量大的家庭。同时,不仅上水要收费,下水也要收费,因为处理污水是要成本的。下水也实行阶梯水价,排放的污水量越大,收费越高。在一些发达国家,不少家庭都用容器将污水二次利用,除了有环保意识外,更重要的是实行污水阶梯收费制度。这样排放的污水少了,保护环境的成本也降低了。对于企业用水,可以实行比较高的价格,目的在于鼓励企业节约用水,促使其转变发展方式。因此,调价不是目的,关键是改革水价形成机制。

四、构建市场竞争型火车票价形成机制

在当前中国要找计划经济体制的痕迹,最明显的就是火车票。因为,一则火车票完全由铁道部确定,普通火车票价低于同里程汽车票价。二则对一些群体如军人、学生等存在暗补,也就是可以买半价票。其结果导致火车票一到节假日一票难求,难免就出现了倒爷。虽然每次警方都严厉打击,但倒票问题从未解决,以致内外勾结,排队的人买不到票,买票的人不排队,不开后门买不到票等等。倒爷随便一张票少则加价几十元,多则数百元,不少倒爷成了百万富翁。倒票意味着短缺,意味着供不应求,供不应求价格就上涨,但由于票价是事先定死的,涨不了,于是就出现票价内外差,催生了倒爷。价差没有进入国家手中,而是进入了倒爷和少数内鬼手中。四十岁以上的人应该都有深刻的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大特征就是短缺。火车票的短缺就是计划经济体制导致的。同样都是交通工具,高档的有飞机,低档的有汽车,为什么没有人去倒卖飞机票和汽车票,唯独倒卖火车票,因为飞机票放开了。以北京到郑州为例,直线距离大约 800 公里,不打折的飞机票 800 元左右,加上机场建设费以及两地往返机场的费用,没有 1000 元是下不来的。乘客多的时候不打折,乘客少的时候就打折。自然票价高的时候,乘用飞机

的人绝大多数都是高收入者,票价打折的时候有的才二折三折,同样的距离花钱不足200元。于是中低收入者也可以买得起飞机票,享受一把。因此飞机票的折扣成为控制客流的重要手段。汽车票为什么也没有人倒卖,是因为汽车运输市场放开了,更多私人汽车运输公司诞生了,几乎可以做到人满发车,满足了乘客对汽车运输的需要,而且票价也比火车票高。

要解决火车票的短缺问题就是放开市场,形成火车票的市场定价机制。而要形成市场定价机制,自然需要培育市场主体,不能是铁道部一家,而且政企合一。这样票价稍一涨,立即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前几年春运票价上浮,本意是通过价格调峰,结果引起社会不满,最终还得回归原价,因为你是政府,你要代表老百姓的利益,特别是春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再穷也要回家过年,吃个团圆饭,图的不是别的而是亲情和吉利。上涨10%~20%不足以起到调峰的作用,相反的是让几乎所有乘车的人多掏了腰包,自然就有意见。飞机票在春运期间也提高价格,为什么没有人质疑,是因为飞机票是各大航空公司自己定的。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对目前的铁路运输体制进行改革。其实,铁路运输体制改革完全可以借鉴民航市场的经验,当然借鉴不是照抄照搬。铁路经营与火车经营要分离,铁路可以是国家所有,当然也可以是公司所有,负责修建和维护铁路,对在铁路上运营的火车收取租金。运输工具如火车则可以由多家经营,同一条铁路上可以跑多家企业的火车。可以有经济型火车,也可以有豪华型火车;可以有普通速度的火车,也可以有高速列车。既可以满足一般乘客的需要,也可以满足高收入者的需要。火车票价完全由火车经营公司确定。如果同样的服务,你的票价比别人高,自然没人买你的票,最终还得降下来。如果火车票价大幅度提高,一部分乘客就会选择飞机,另一部分乘客就会选择汽车。最终汽车、火车、飞机大体形成均衡局面。如果更多的人愿意坐火车,火车运输利润必然提